



明代白族学者 李元阳的理学情愫

刘欣

李元阳(1497~1580)明代白族文学家、史学家、理学家。字仁甫,云南大理人,世居点苍山十八溪之中,号中溪,别号逸民。李元阳的一生可以分为少年学习,中年为官,晚年辞官乡居三个时期。在前两个时期他学习并接受了儒家学说,对阳明心学情有独钟。后期他倾向于儒、释杂糅,从心学出发,援佛家之禅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学思想。李元阳著述广泛,有诗文集《艳雪台诗》《中溪漫稿存稿》,理学著作《心性图说》,史学著作《大理府志》等。其融合佛、道、儒形成的理学思想,使他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李根源在《重刊中溪家传汇稿序》中评价李元阳:“先生之学以佛人,以儒出,复性为本,济世安民为用。”

《心性图说》从本体论、认识论到方法论完整地构建了李元阳的理学思想体系,极大地推动了明代理学的发展。

李元阳独特的心性观得益于他与当时理学名家间密切的学术交流。王畿,字汝中,号龙溪,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阳明后学重要代表人物。《中溪全集》中存有《与王龙溪年兄》《答王龙溪年兄》《再答王龙溪》三通书信,在第一封信中,他和王畿论证并厘清了理学上“知”“识”的概念。第二封信中,他把《心性图说》寄与王畿并向他请教。第三封信,李元阳说他虽不能从阳明之师门,但阳明先生“致良知”三字,直继孟子之统。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安府吉水人,亦为当时心学大家。李元阳理学思想的发展和罗洪先有相似之处,他们早年思想的核心都以“践履”为主。不过此后李元阳转向了“寂感”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观。在李元阳写给罗洪先的信中,李元阳先请教了性、心、义、情识的差别,这与给王畿的信中所谈论的“知”“识”内容相近。在另一封信中,他向罗洪先叙述了自己与王龙溪切磋学术的情况。

此外,李元阳与南中学者、泰州学派的唐顺之、罗汝芳也多有联系。李元阳通过与他们进行书信交流,在理学上相互切磋,使自己的理学观在继承陆、王心学之外得以以一种独特形式展开。

为官:公正廉洁深受爱戴

李元阳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其母在生他之前“梦龙负日入怀者三”,故取名“元阳”。李元阳自幼沉默寡言,但聪明过人,勤读诗书,尤好文史,于嘉靖元年(1522)中举人,为云贵乡试第二;嘉靖五年中三甲进士,“名动京师,为十四才子之冠”,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嘉靖六年出任江西分宜知县,分管江西乡试。嘉靖七年,李元阳母亲去世,回乡守孝。

嘉靖十年,李元阳守孝期满,出任江阴知县。在江阴知县任上,他爱民养民公正廉洁,深受百姓爱戴。嘉靖十二年李元阳迁户部主事,离任之日江阴百姓流泪相送百余里,并为他立生祠,刻碑记其善政百余事以兹纪念。李元阳调入户部后,内阁大学士夏言有意招延,但为李元阳拒绝。不久他改任江道监察御史。嘉靖十八年,李元阳调回北京,他疏劾大学士夏言用人不公;他还上疏谏止皇帝巡幸承天,皇帝大发雷霆,大臣们都惊惧不能入眠,李元阳却鼾睡达旦,同僚称其为“真御史”。正是这种直言不讳使他在官场上屡屡碰壁,夏言借“荆楚要地,元阳堪任”将李元阳调到荆州,当时荆州“四百余里无井泉,先生至,即捐俸穿井数十,又作石池以饮马。”当地老百姓遂以“李公井”来命名。李元阳在荆州任上最值得一提的是从参加考试者中识拔了年仅十三岁有“神童”之称的张居正。

嘉靖二十年,李元阳以父丧归乡。其后四十年,里居不出。他将婚嫁丧葬、饥寒冤抑、桥堤道路等列为其乡居三十二事,用三十年时间修复崇圣寺,还创建、修治了如传衣寺、龙华寺、观音庵、千佛阁等诸多寺院。《鸡足山志》中称赞他,“山中寺院凡倾颓者,无不修复,并为撰文,鸡山之盛,公为首功矣。”

为文:兼容并蓄促进交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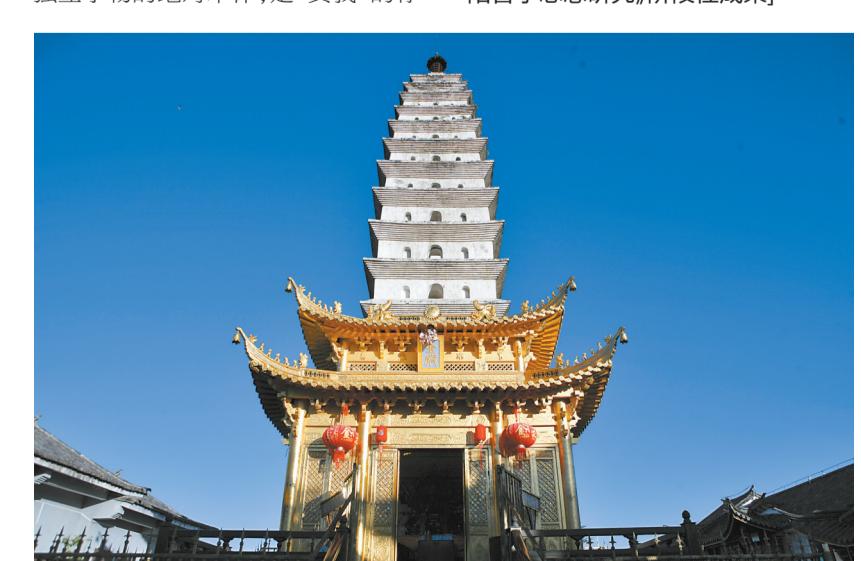
云南与内地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随着汉文化在云南广泛传播,云南与中原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原文化在云南的传播不是简单的单向性传播,而是双向的,即中原文化在向云南传播的同时也积极吸纳云南的当地文化。这在以李元阳为代表的云南学者身上尽得体现。

李元阳回乡后寄情于苍山洱水之间,省却了尔虞我诈的倾轧,再无宦海的羁绊,与杨士云、杨慎、张含、李攀等文化名流诗文唱和,勤于著述,著有诗文集《艳雪台诗》《中溪漫稿存稿》,于晚年编纂了《嘉靖大理府志》和《万历云南通志》。由于他在哲学、史学、文学、书法、教育诸方面的突出成就,被誉为“史上白族第一人”,在云南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李元阳曾言“云南古荒服之地,自汉始通中国,然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惟纲常之道粲然明于世,而礼乐刑政所以管束人心,维持世道之具胥此焉。”他认为只有依靠儒家学说才能维持云南的稳定和谐进而保证边疆繁荣与发展。另一方面,他深谙云南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认为“教无类也,孰谓异俗之不可化哉!今夫云南荒服之人,……一旦举中国之治以加之,……他日化俗定,人才辈出,彬彬乎齐鲁之风。”

纵观李元阳一生,他对理学的仰慕、学习、吸收和发展的反映的是对中原创先文化的向往。对于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汉文化,他并没有站在本民族的文化立场上加以排斥,而是自觉地学习,在主动融入的同时也创造性地发展。李元阳的理学情愫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古代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古已有之,并源远流长。“嘉靖八才子”之一任忠斋评价他:“中溪晚年之学,如霜清月晏,万象森严,长松在壑,剥落英华,收敛神气,复归乎其根也”。李元阳之后的明清云南省志和大理地区的府县志,多为之立传,表彰其事迹,在白族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有关李元阳的故事传说。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本文系云南省社科院2021年院级项目《明代云南白族学者李元阳哲学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



大理鸡足山楞严塔 本报记者 黄兴能 摄

我党如何通过调查研究 推进云南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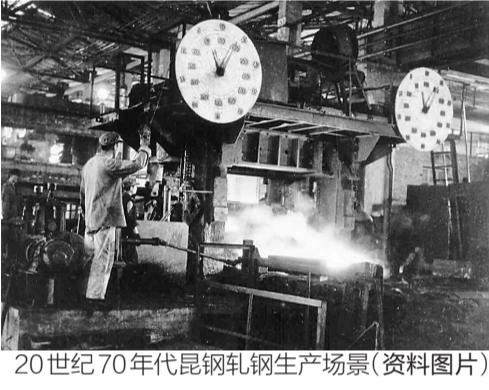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为例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文稿组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一直以来,调查研究对云南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调查研究对推动云南正确决策与解决发展难题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为云南在这一时期的各项工作开创了新局面。



西双版纳农业发展促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黄兴能 摄



20世纪70年代昆钢轧钢生产场景(资料图片)



昆钢王家滩铁矿工作场景(资料图片)

调查研究是深化省情认识的重要法宝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历史事实证明,调查研究是云南深化省情认识、推进正确决策的重要法宝。

中央历来重视云南地区经济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橡胶的封锁,党中央决心在海南岛和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光热充沛,水土富有的热带地区发展橡胶产业。1979年1月,国务院和省有关部门与西双版纳州相

关人员组成规划组,对西双版纳州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问题进行了实地调研,制定并呈报中央《关于西双版纳经济发展规划的方针政策性意见的报告》,提出“以林、橡胶为主,粮食自给,多种经营”的发展方针。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充分利用光热条件和热区优势,因地制宜落实产业结构调整,至“七五”期间云南成为全国第二大橡胶业生产基地。

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党的十三大精神的指引和启示下,云南省委组织相关调研组对云南历史资料和现实情况作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深化了对省情的认识,得出云南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的结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或分层发展过程,是云南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此后,云南各方面工作都立

足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这一特点,一切从这一实际出发,并依此制定云南发展的思路和政策,走出了一条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农业促轻工,依靠轻工积累资金,集中财力保重点建设的路子。到20世纪80年代末,云南形成了烟、糖、茶、胶四大支柱产业,解决了“钱袋子”的问题,全省财政从1983年的17亿元增加到1993年的200亿元,10年增长了12倍,由一个财政净补贴省变为财政净上缴省。

全省建成商品粮基地县34个,高产稳产农田2600万亩,粮食产量达60多亿公斤,占当年全省粮食总产量的一半。经过10多年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云南长期缺粮的问题,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何将富饶的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是云南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难题,“鲁奎山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为了增加钢铁年产量,解决原料问题,玉溪新平县扬武镇鲁奎山铁矿经省计委同意作为昆明钢铁厂接替矿山纳入国家计划。考虑到平衡地方利益,1986年8月,省委、省政府提出由昆钢与地方政府联合办矿,开发利用资源与发展民族经济紧密结合的方针。1987年6月,省委农村工作部派人到鲁奎山对几个月来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形成《关于新平鲁奎山铁矿开发情况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矿山从组建领导班子以来,仅8个月时间,工作进展顺利,建

设速度快,而且节约了投资,矿群关系也较为密切。”1988年和1989年,省委、省政府调研组两次到鲁奎山铁矿开展调查研究,召开现场办公会。在1989年2月召开的全省矿山建设现场会上,将“鲁奎山经验”总结为两个结合:国家开发资源与发展当地民族经济、提高民族文化技术素质相结合,中心城市加工工业与农村原料基地的建设紧密结合。鲁奎山铁矿自建矿至2000年,共生产铁矿石420万吨,上缴利税1亿多元,矿区所在的丕且莫村摘掉了特困村的帽子,扬武镇成为经济和社会事业欣欣向荣的繁荣集镇。

1993年12月中旬至1994年1月上旬,云南省委到临沧等地调研,解决云南改革和发展如何再上一个新台阶的问题,调研结果反映出云南经济结构上仍存在着两个单一,一是所有制结构较单一;二是产业结构较单一。1995年3月,省政府作出实施“18生物资源开发工程”的决定,要求全省开发18项生物工程,力争

到2000年,每个单项达到5亿元以上产值。同年8月,省第六次党代会明确了第二次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着力培植以食品为重点的生物资源开发产业,以磷化工、有色金属为重点的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和旅游产业,力争到本世纪末形成若干个年产值数百亿元的新的支柱产业。1996年12月,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加快四大支柱产业建设的决定》,决定发展烟草产业、以食品为重点的生物资源开发产业、以磷化工和有色金属为重点的矿产业、以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为特色的旅游业四大支柱产业。2000年11月,省委六届十一次全会做出了把以水电为主的电力产业作为新的支柱产业的决定。通过深化改革,不断调整和完善产业结构,云南形成了烟草、矿业、电力、旅游、生物资源开发创新五大支柱产业集群,基本改变了过去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单一的状况,使云南经济走到了西部省区前列。

优秀的调研报告是破解难题的指导性文件

全省建成商品粮基地县34个,高产稳产农田2600万亩,粮食产量达60多亿公斤,占当年全省粮食总产量的一半。经过10多年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云南长期缺粮的问题,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何将富饶的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是云南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难题,“鲁奎山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为了增加钢铁年产量,解决原料问题,玉溪新平县扬武镇鲁奎山铁矿经省计委同意作为昆明钢铁厂接替矿山纳入国家计划。考虑到平衡地方利益,1986年8月,省委、省政府提出由昆钢与地方政府联合办矿,开发利用资源与发展民族经济紧密结合的方针。1987年6月,省委农村工作部派人到鲁奎山对几个月来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形成《关于新平鲁奎山铁矿开发情况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矿山从组建领导班子以来,仅8个月时间,工作进展顺利,建

设速度快,而且节约了投资,矿群关系也较为密切。”1988年和1989年,省委、省政府调研组两次到鲁奎山铁矿开展调查研究,召开现场办公会。在1989年2月召开的全省矿山建设现场会上,将“鲁奎山经验”总结为两个结合:国家开发资源与发展当地民族经济、提高民族文化技术素质相结合,中心城市加工工业与农村原料基地的建设紧密结合。鲁奎山铁矿自建矿至2000年,共生产铁矿石420万吨,上缴利税1亿多元,矿区所在的丕且莫村摘掉了特困村的帽子,扬武镇成为经济和社会事业欣欣向荣的繁荣集镇。

撰写了《关于加快边疆山区生产力发展问题的调查报告》,指出:“在边疆和民族山区,思茅地区的经验证明,在生产方式和生产经营体制上来了一个根本变革,实行城乡结合、科技与经济结合、开放与开发结合、农工商一体化的经营体制,完全有可能使这些地区的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跳跃式、跨越式的飞跃,与其他民族共同繁荣。”这篇调研报告实际上在全国还没有提出农业产业化之时就提出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如何走农业产业化道路的问题。1993年1月3日,省委依据调查报告发出相关学习通知,并作为当年第1号文件下发,要求全省学习贯彻,指出“三结合一体化”指明了边疆民族山区实现生产力跳跃式发展的路子。此后,全省各地迅速掀起大办商品生产基地的热潮,至1994年,全省建立起30多个商品粮基地县、25个甘蔗基地县、30个优质茶叶基地县、31个商品猪基地县、21个牛羊商品基地县和5个禽蛋基地县。

继续大兴调查研究 不断夯实发展成果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云南推进的一系列改革,解决的一系列难题,实现的一系列进展,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无不凝聚着调查研究付出的心血和获得的智慧。继续推动调查研究,是助推云南落实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方面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调查与研究并重,不仅要了解实情、掌握好第一手资

料,还要在研究上下一番苦功夫、深功夫、细功夫。另一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群众中藏着解决问题的金钥匙。只有通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才能获得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才能制定出符合规律的科学决策。

近年来,云南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但欠发达和后发展的省情没有改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我们要推动调查研究走深走实,发挥云南区位、绿色能源、高原特色农业、文旅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劳动力等优势,及时把握机遇,在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执笔:赵妍)